

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证分析与提升路径

廖志高 郭攀硕 简克蓉

广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，广西柳州，545000；

摘要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是破解发展不平衡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。本文构建“资源禀赋—创新能力—结构升级”三阶段模型解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，基于生产力三要素构建指标体系，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 2012—2023 年西部 12 省（区）新质生产力水平，并结合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区域制约因素。研究发现：（1）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，但仍处于较低水平，地区间发展不均衡；（2）不同省份的制约因素不同，根据各个省份的特征，将其划分为创新驱动型、科技积能型、绿色突破型和基础夯实型四类，并提出差异化的提升路径，为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。

关键词：新质生产力；因地制宜；西部地区；提升路径；区域经济发展

DOI：10.64216/3080-1486.26.02.030

引言

西部地区作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^[1]。2024 年，西部地区 GDP 在全国占比约 21.3%，远低于东部地区的 52.1%。西部地区生产力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^[2]，制约了经济潜力的释放，并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阻力。尽管国家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战略，但西部地区在自然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科技能力等方面仍与东部存在差距，导致东部的经验难以照搬至西部。因此，如何因地制宜地提升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，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。

新质生产力是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形态，具备创新性、融合性和超越性等特质，是科技创新与高端产业融合的高级形式。新质生产力被定义为劳动者、劳动资料、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^[3]，其核心是全要素创新，载体是现代化产业，目的是高质量发展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^[4]。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根据区域特点，立足实际情况，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，避免“一刀切”的做法^[5]。

现有研究多侧重全国层面，或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情况^[6]。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，但区域间差异显著，主要表现为东、中、西部区域之间的差异。其中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，中部次之，西部最小^[7]。这种分布特征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也为西部地区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研究方向。

关于新质生产力提升路径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

面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从技术创新、要素配置等多方面着手^[8]。还有学者强调政策支持至关重要，完善产业政策、税收优惠等，能为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^[5]。然而，现有研究大多缺乏针对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，缺少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具体的操作路径。

本文旨在填补现有研究中的空白，聚焦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提升新质生产力的路径，试图解决以下问题：一是揭示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及其瓶颈；二是提出切实可行的提升路径，支持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践。基于此，本文从因地制宜出发构建“资源禀赋—创新能力—结构升级”三阶段演化机制模型，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，并结合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制约因素，进而提出适合西部的提升路径。

1 研究设计

1.1 因地制宜发展西部新质生产力的三阶段逻辑

“资源禀赋—创新能力—结构升级”三阶段模型从区域发展的实际出发，划分为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。第一阶段依赖资源禀赋，核心要素包括自然生态资源、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，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起步路径和产业布局，形成技术和产业路径锁定效应。第二阶段聚焦创新能力的提升，促进新劳动者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，但西部仍面临人才外流、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。第三阶段为结构升级，通过数字化、绿色化和智能化手段，实现数据要素重组和产业系统的变革，推动知识型和复合型劳动者的崛起，形成以人力、技术和数据为核心的

新生产力体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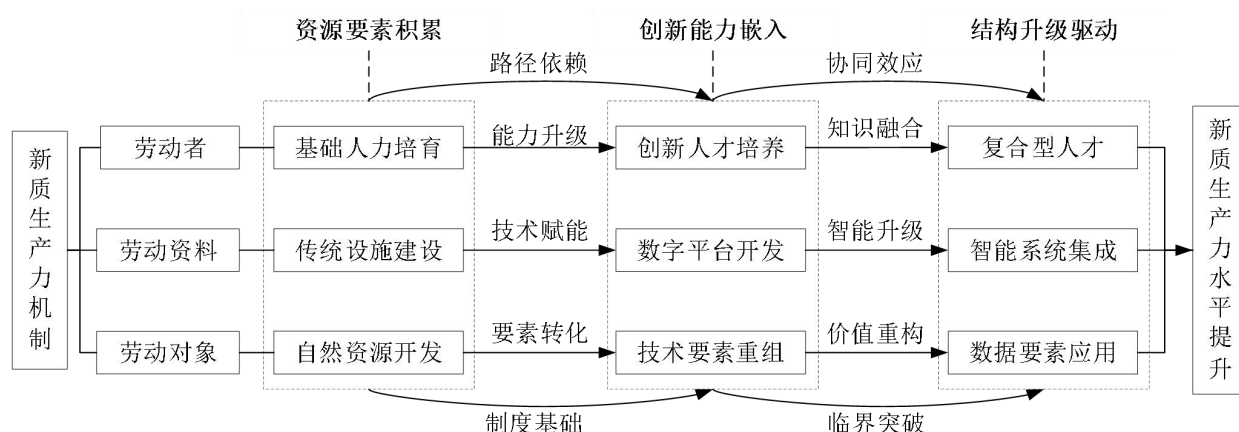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生成与演化机制模型

1.2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

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，其理论基础源于传统生产力理论，并融合数字化、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时代特征，重塑了生产力要素的内涵与外延。从理论上看，新质生产力由新劳动者、新劳动资料和新劳动对象三大核心要素构成，要素通过协同优化共同提升生产效率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。本文借鉴了相关学者的研究^[9,10]，构建了以三大要素为核心、涵盖多个二级与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，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。

1.3 数据来源

本文选用了覆盖 2012 至 2023 年间西部地区（包括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重庆、西藏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广西 12 个省）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，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《中国统计年鉴》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》等。针对数据集中存在的缺失值，采用了线性插值法进行了合理补全，以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。

1.4 研究方法

1.4.1 熵权 TOPSIS 法

传统熵权法忽略了指标间的相关性，导致权重分配不合理。熵权 TOPSIS 法通过考虑指标相关性，准确反映其相互影响，提高了权重分配的可靠性。借鉴相关研究（董庆前 等，2024）^[11]，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，先通过熵权法确定权重，再用欧氏距离计算与理想方案的接近度进行排序评价。

1.4.2 障碍因子分析

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进

行障碍因子分析，辨识出不同省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，公式如下：

$$I_j = 1 - x_{ij} \quad (7)$$

$$L_j = \frac{F_j I_j}{\sum_{j=1}^n F_j I_j} \quad (8)$$

其中， L_j 表示障碍度， I_j 表示指标偏离度， x_{ij} 表示指标标准化值， F_j 表示指标的准则层与指标层权重乘积，即指标重要程度。

2 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实证分析

本部分旨在揭示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征，通过水平测度评估发展现状；结合实际数据深入分析影响西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，为针对性提升路径设计提供数据支撑。

2.1 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分析

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综合评价法对西部地区 2012-2023 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分析。2012-2023 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均值为（E）0.178，标准差为（SD）0.031，总体呈逐步提升的态势。观察西部地区，2012-2023 年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均值为 0.139，2012 年的发展水平为 0.103，到 2022 年增长至 0.176，年均增长率约为 5.11%。尽管西部地区整体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，但增速略高于全国，反映出西部地区在新质生产力提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借鉴现有学者的方法^[12]，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均值（E）和标准差（SD）的关系，将所取样本划分为

第一梯队（得分大于 $E+0.5SD$ ）、第二梯队（得分介于 $S-0.5SD$ 和 $S+0.5SD$ 之间）和第三梯队（得分小于 $E-0.5SD$ ）三种类型，结果如图2。

第一梯队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高于 0.194，包括重庆（0.202）、陕西（0.201）、四川（0.197）3 个省份，占比 23%。第一梯队得益于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、完善的产业基础，展现出对区域发展的显著带动作用。第二梯队得分介于 0.163—0.194，仅包括云南（0.166），占比 8%。云南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一定的技术创新基础，加速资源向新兴产业转化，但整体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效率较弱，仍需加强科技投入与政策支持。第三梯队省份得分低于 0.163，包括内蒙古（0.150）、广西（0.136）、贵州（0.124）、新疆（0.120）、西藏（0.115）、甘肃（0.105）、青海（0.077）、宁夏（0.075）8 个省份，占比 62%。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，与第一梯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。其中，青海和宁夏的得分仅为第一梯队的三分之一，反映了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滞后性。

2.2 障碍因子分析

为更加科学地推动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制定，因篇幅限制本文选取 2023 年西部各省排名前三的障碍因子，结合测度得分与障碍因子识别结果，将西部 12 个省份划分为创新驱动型（重庆、陕西、四川）、科技积能型（云南、内蒙古、贵州、甘肃、新疆、宁夏）、绿色潜能型（广西、青海）和基础夯实型（西藏）四类类型，并将其映射到“资源禀赋—创新能力—结构升级”三阶段内生增长机制中。

（1）创新驱动型省份主要处于结构升级主导阶段，创新能力已较为完备，但绿色转型与成果扩散仍面临瓶颈，障碍集中在新能源发电量比重、新兴产业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。以四川为例，尽管清洁能源产量居全国首位，但传统水电占比偏高，新能源结构仍有优化空间，新兴产业对就业的带动能力亦有待增强。

（2）科技积能型省份处于创新能力形成阶段，资源基础尚可但创新体系不健全。主要障碍表现为 R&D 投入偏低、研发平台数量不足、高技术人才短缺与成果转化能力弱等。以甘肃、贵州、宁夏为例，其 R&D 经费投入强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研发人员与高技术企业数量也明显偏少，制约了技术积累和产业链迈向中高端。

（3）绿色突破型省份位于资源禀赋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的关键期，虽具生态与新能源优势，但资源转化效率低、绿色产业链不健全，障碍集中在新能源开发效率、绿色制造能力与治理水平等方面。如广西虽有丰富的水能和生物质资源，但缺乏规模化、集约化的开发项目，绿色资源未有效转化为结构优势。

（4）基础夯实型省份仍处于资源禀赋主导阶段，整体发展基础薄弱。西藏在基础设施建设、新兴产业发展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，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受地形制约，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路径尚未建立。

3 因地制宜提升路径

3.1 结论

本文研究结论如下：

（1）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，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。重庆、四川、陕西位列第一梯队，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与资源整合优势；云南位于第二梯队，发展潜力较大；其余八省份处于第三梯队，受制于基础设施、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等因素，发展相对滞后。

（2）西部地区不同省份制约因素存在差异，西北地区以研发能力短板为主，西南地区新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突出，部分欠发达地区新兴产业基础薄弱。

3.2 提升路径

3.2.1 缩小区域差距，推动协调发展

一是建跨区域协作网络，如川渝双城经济圈和西北能源联盟，促进科技创新、能源调配和人才培养，打破行政壁垒，实现要素共享。二是实施差异化产业布局，支持西南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，西北地区依托风光资源发展“风光储氢”产业链，推动能源转型。三是优先建设西北交通干线和西南通信网络，提升欠发达地区要素流通效率。

3.2.2 强化创新引领，激活科技潜能

一是加速新兴产业发展，培育高端装备产业，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。二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，支持数字经济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攻关，逐步接轨全国平均水平。三是完善创新生态，建设科技孵化器和转移中心，促进技术成果转化；加强与东部地区合作，引入外部技术，共建研发平台。

3.2.3 优化绿色产业链，夯实基础设施

一是推动新能源规模化开发,加强绿色产业延链补链,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,探索绿色金融创新,支持环保技术研发和绿色园区改造。二是加快川藏铁路、边境5G网络建设,解决偏远地区用电问题,提升交通物流和通信设施。三是依托本地资源,发展地热、光伏等特色产业,结合生态优势探索“文旅+碳中和”,定向培养技能人才,为新兴产业提供支持。

参考文献

- [1]胡莹.新质生产力的内涵、特点及路径探析[J].新疆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4,45(5):36-45,2.
- [2]蒲清平,向往.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—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[J].新疆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4,45(1):77-85.
- [3]任宇新,吴艳,伍喆.金融集聚、产学研合作与新质生产力[J].财经理论与实践,2024,45(3):27-34.
- [4]张林,蒲清平.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[J].重庆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29(6):137-148.
- [5]蒋永穆,乔张媛.新质生产力:逻辑、内涵及路径[J].社会科学研究,2024(01):10-18+211.
- [6]栗向阳,王磊,张宇欣.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[J].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,2024,33(5):909-923.
- [7]卢江,郭子昂,王煜萍.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、区域

差异与提升路径[J].重庆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4,30(3):1-17.

[8]彭绪庶.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、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[J].经济纵横,2024(03):23-30.

[9]王珏,王荣基.新质生产力: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[J].西安财经大学学报,2024,37(1):31-47.

[10]韩文龙,张瑞生,赵峰.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[J].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,2024,41(6):5-25.

[11]董庆前.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、时空演变及收敛性研究[J].中国软科学,2024(8):178-188.

[12]施雄天,余正勇.我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、结构分解及空间收敛性分析[J].工业技术经济,2024,43(5):90-99.

作者简介:廖志高(1977.9),男,汉族,湖南隆回,教授,博士,研究方向:决策理论与方法、区域协调发展。

郭攀硕(2000年7月),女,汉族,河南周口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新质生产力。

简克蓉(1978年10月),女,汉族,四川雅安人,高级经济师,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低碳经济、数字经济。

基金项目:柳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(25CEL11)